

马来西亚华文报的语言传播与华人文化共同体建构机制研究

田秀华

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61113；

摘要：在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马来西亚社会中，语言不仅承担交流功能，更深度嵌入族群认同与文化归属之中。华语虽在国家公共语言体系中处于非主导地位，却通过特定媒介空间获得了持续的社会可见性。作为华人社会的重要传播形态，华文报依托稳定的出版制度和以书面华语为核心的语言实践，使华语在公共传播中获得规范化呈现，并逐步积累文化象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华语由个体层面的交流工具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共同体语言，并在长期、重复的媒介使用中参与塑造华人社会的共同文化想象。尤其是在嵌入日常生活节奏的阅读实践中，华文报通过高频率、常规化的语言接触，持续强化读者的文化认同与群体归属感。由此可见，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与延续，更多依赖于日常传播结构中语言经验的持续再生产，而非单一的宏大叙事或显性动员。

关键词：马来西亚华人报；语言传播；文化共同体

Language Communication of Malaysian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and the Mechanisms of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Tian Xiuhua

School of Marxism,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iyang 561113, Guizhou, China

Abstract: In Malaysia's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social context, language functions not merely as a communicative instrument but as a key cultural resource embedded in processes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cultural belonging. Although certain community-based languages occupy a non-dominant position within the national public language regime, they have maintained sustained social visibility through specific media domains. As an enduring form of community-oriented print media, vernacular-language newspapers rely on stable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standardized written language practices, enabling these languages to acquire a normalized presence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to accumulate cultural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over time. Through repeat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media use, language is transformed from an individual-level communicative tool into a shared medium with public attributes,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ve cultural imagination. In particular, when embedded in everyday reading practices, vernacular newspapers generate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a sense of group belonging through frequent, routine, and low-intensity language exposur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of cultural communities are less the result of explicit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or grand narratives than of the ongoing reproduction of language experience within everyday media structures.

Keywords: Malaysia; vernacular-language newspapers; language dissemination; cultural community

DOI: 10.64216/3104-9672.25.04.037

在马来西亚这一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社会结构中，语言并不只是日常交流的工具，而是深度嵌入族群认同、文化归属与社会分层之中的重要社会要素。不同语言在公共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制度地位与象征意义，往往与族群历史经验和社会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此意义上，语言问题成为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及其文化认同的重要切入点。作为华人社会最具持续影响力的媒介形态之一，华文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早已超出单纯的信息传播范畴，其通过稳定的出版机制和以华语为核心的书写实践，在无形中参与了华人社会文化经

验的组织、表达与再生产，因此，也有“在大马不读华文报，只能看到‘半个马来西亚’”^[1]的说法。语言并非自然地等同于文化共同体。只有当语言通过稳定、持续且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传播机制被不断使用、重复与确认时，才能转化为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资源，进而塑造马来西亚华人群体形态。尤其是在多语言公共空间中，某一语言的持续使用将获得超越个体交流层面的公共可见性，并逐渐积累起独特的象征意义。华文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华语从个体层面的交流工具，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和象征价值的文化媒介，并在长期语言实践

中参与塑造华人社会的共同文化想象。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马来西亚华文报置于多语言社会的整体语境中加以考察,重点分析其通过语言规范化、象征化与日常化等机制,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内在过程。

1 马来西亚多语言社会语境下的华文报与华语传播

“马来西亚既是海外华文报刊的发祥地,又是当今世界海外华文报业最发达的国家”。^[2]在马来西亚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华文报及其语言传播功能,首先需要对马来西亚整体语言结构及其社会分层逻辑加以把握。华文报及其华语传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嵌于马来西亚多语言并行、功能分化明显的语言生态之中。不同语言在公共领域中的制度地位与使用边界,直接影响着各类媒介的传播空间与社会功能。

1.1 多族群、多语言社会中的语言分层与功能结构

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族群、多语言社会,该社会语言格局与族群结构、政治制度以及历史进程之间存在高度关联。马来西亚宪法将马来语定为国家官方语言,奠定了马来语在政府行政、公共教育及官方传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殖民历史遗产与全球化进程的共同影响下,英语也长期活跃于商业、科技和高等教育领域,承担了马来西亚内部以及马来西亚与国家外部的跨族群沟通功能。相较之下,华语主要在华人社会内部流通,其在国家层面的公共使用空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简言之,马来语与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紧密相连,英语承载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象征意义,而华语则更多被视为族群文化与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可见,不同语言呈现出不同的功能类型。

虽然在国家主流公共领域,华语的全景传播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制度性限制,但鉴于华语在华人社会内部具有广泛的使用基础,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华语社会影响力的消失,反而促使其逐渐超越了单纯的交流工具属性,被赋予了更为突出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的意义。华语作为华人社会内部维系群体边界、传递文化价值和强化共同记忆的重要语言资源,在多族群社会中以更具象征性的方式获得了持续使用和继承。

1.2 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发展格局与传播定位

马来西亚华文报的形成与发展,植根于华人移民社会的历史演进及其内部的信息传播需求。自19世纪末华人大规模定居马来半岛以来,围绕商业往来、社会事务与族群公共生活的沟通需求不断增长,以华语为书写媒介的报刊逐渐出现,并在20世纪初形成相对稳定的

出版体系。此后,《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华日报》《中国报》等主流华文报持续出版,构成了以华语传播为核心、面向华人社会的报业格局,为华人社会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媒介平台。

在马来西亚多语言媒介结构中,华文报具有明确而相对固定的传播定位:即以华语为主要传播语言,面向华人社群内部,承担族群公共沟通与文化表达的媒介功能。这一定位决定了华文报并非简单复制国家主流媒体的新闻模式,而是在语言层面形成了区别于马来语和英语媒体的传播空间。通过持续、系统地使用华语进行公共表达,华文报为华语提供了一个可重复的传播渠道,使其在多语言社会中获得稳定的公共呈现形态。通过新闻报道、评论与副刊等文本类型,华文报在客观上强化了华语的规范性与公共表达能力,使其逐渐具备进入社会议题与文化讨论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华语的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递工具,扩展为承载文化意义与群体记忆的重要媒介资源,为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与延续奠定了基础。

2 语言传播与文化共同体建构的理论逻辑

在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社会结构中,文化共同体并非自然生成的社会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传播结构中被持续建构的社会形态。理解语言传播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若仅停留在“语言反映文化”或“语言维系认同”的层面,往往难以揭示其内在机制。相比之下,从媒介化传播的视角出发,更有助于说明语言如何通过公共传播过程,持续介入群体认同的形成与巩固。

2.1 文化共同体的媒介生成机制

“文化共同体”作为分析概念,其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是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对该理论做出延伸,可知现代社会中的共同体并不依赖成员之间的直接交往,而是通过印刷媒介等传播方式,使彼此陌生的个体在共享语言、符号与叙事的过程中,形成对“共同体”的想象性认同。这一视角提示我们,共同体并非先验存在的社会事实,而是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生产和确认的结果,是“地缘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或凝聚社会力量、传承文化、服务治理的载体等”^[3]。正是借助媒介所提供的稳定传播渠道和重复传播机制,共同体得以在时间和空间上被不断“召唤”,并在日常接触中逐步内化为一种看似自然的社会存在。

在多族群社会中,“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具体的实体”^[4],往往并不与政治共同体完全重合,其生成更多依赖于族群内部共享的文化资源与传播渠道。语言作为最具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的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为这种共

同体想象提供了基本载体，“成为传播共同文化、拓展文化共同体疆界的重要媒介”^[5]。当语言通过媒介传播进入公共空间，并以相对固定的形式被持续使用时，分散的个体便能够在语言所承载的意义框架中，建立起对共同文化的认知与想象，并在反复接触同一语言表达与叙事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同意识。

2.2 语言的公共化与文化认同形成

从传播学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并非天然具有公共属性，而是需要通过特定的传播机制才能进入公共领域并获得社会意义。某种语言是否能够被广泛看见、反复使用并参与公共讨论，往往取决于其所处的传播环境，而非语言本身的结构特征。在多语言社会中，语言进入公共传播空间的程度，直接影响其在群体认同建构中的功能与地位。

当一种语言通过公共媒介被持续使用时，意义也就开始发生转变。语言不再仅仅服务于个体之间的交流，而是成为群体共享经验的重要表达形式。语言在公共传播中使用，使特定语言被不断纳入社会议题、公共叙事与集体讨论，加强了语言与群体的历史经验、价值观念和文化记忆的稳定联结。在持续的使用过程中，语言逐渐被赋予区分“我们”与“他者”的象征功能。文化认同也就在这种反复出现和使用的语言实践中被不断确认。印刷媒介时代的到来，形成了新的语言传播结构。语言通过规范化书写、固定语体和持续发行，被稳定地保留下来。稳定性使语言脱离了对个体记忆与即时情境的依赖，形成了一种可被反复接触和共同认知的公共语言形态，即在长期阅读中语言本身逐渐内化为群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媒介传播条件下语言文化功能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是否能够转化为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资源，并不取决于语言自身的结构特征，而取决于其是否被纳入稳定、持续的传播结构之中。只有当语言通过制度化的媒介机制被反复生产、呈现与接受，才能从个体交流层面的工具，转化为具有公共属性和象征意义的文化形态。在这一过程中，媒介并非中性的传递渠道，而是通过内容生产规则、语言选择标准与话语呈现方式，深度参与语言社会功能的塑造。

在多语言社会中，某些语言即使在国家制度层面处于非主导地位，仍可能依托特定媒介空间获得持续的公共可见性，并在长期传播中积累稳定的文化意义。换言之，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可以独立于正式制度或政治权力，在多重传播结构中，通过语言的反复使用与意义确

认而逐步生成。因此，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理解文化共同体，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论证“语言的重要性”，而在于具体分析语言如何在媒介实践中被持续生产、规范使用并赋予文化意义。基于这一理论逻辑，才有了华文报在多语言社会中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3 华文报语言实践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运作机制

在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马来西亚社会语境中，华文报并非单纯的信息载体，而是通过持续、制度化的语言实践，深度参与华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过程并非一次性的意识形态灌输，而是通过书面华语的公共化、文化意义的语言承载以及日常阅读经验的不断累积，形成一种长期、稳定且具有内在自我强化机制的文化共同体再生产过程。

3.1 书面华语的公共化：语言形式的稳定生产

报纸作为高度制度化的媒介形态，其语言生产具有固定栏目、稳定版式与专业编辑流程，这使华语在公共空间中获得了持续、可复制、可预期的传播形态。

华文报通过对书面华语的持续使用与规范化呈现，将华语塑造成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语言形式。

在多语并存的社会环境中，语言是否能够进入公共领域，取决于其是否具备稳定的媒介承载机制。华文报通过每日出版与长期发行，使华语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或族群内部的口语交流，而是转化为一种可以被反复阅读、引用与讨论的公共书面语言。报纸的出版、发行，当然不是数量上的重复，更是一种形式上的规范再生产和加强巩固的过程。华文报在用词选择、语体风格、叙事方式等方面形成相对一致的语言惯例，使读者在长期阅读中逐渐形成对“华文报语言”的熟悉感与认同感。正是在这种可持续、可识别的语言传播中，华语得以成为连接分散个体的重要中介，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语言条件。这一过程是通过报纸媒介传播，将华语从私人交流工具转变为共同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交流系统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形式的“公共化”。

3.2 文化意义的语言承载：华语的象征性运作

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从来不是中性的工具，而是承载文化意义与价值取向的重要资源。华文报所使用的华语语言，不仅用于传递新闻事实，而在报道框架、话语表达与叙事逻辑中，持续嵌入和继承华人共有的历史经验、文化记忆与价值观念。如，华文报通过对节庆、伦理观念、历史事件及华人社会公共议题的语言呈现，使华语与华人文化深层交织、相互融入。在对传统节日、

宗族活动或传统文化的报道中，语言不仅描述事件本身，更通过特定词汇与表达方式，唤起共同的文化经验与象征认知。这种通过对当下议题的报道和讨论，引领和塑造了当下共同的语境。通过这种赋予内涵的语言实践，华语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赋予超越工具理性的象征意义。这种传播过程实现了一种文化主题的语言化与再语境化。总之，华文报通过反复使用具有文化指向性的语言符号，将分散的文化元素整合进公共传播之中，强化了读者将语言使用与文化归属联系起来。长此以往，华语不再只是“使用的语言”，而逐渐成为“属于我们的语言”，在象征层面强化了文化共同体的边界意识。

3.3 日常阅读中的认同生成：语言经验的持续再生产

除了有宏大叙事，华文报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常、低强度但高频率的语言接触，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持续生成认同感。报纸阅读往往嵌入个体的日常生活节奏之中，以一种看似平常却极为稳定的方式，反复强化读者对“我们是谁”的理解。这种日常化、常规化的语言供给，使文化认同得以在不经意中、潜移默化中被不断唤起和强化。

马来西亚主流华文报设有固定的版块，叙事方式和风格也较为稳定，可以为日常语言经验使用和学习提供持续的内容来源。例如，《星洲日报》《中国报》《光华日报》等报纸长期设置国内外新闻版、地方新闻版、副刊版与专栏版，构成了较为稳定的信息结构，在语言层面也形成了高度可识别的表达风格。其中，副刊、文化专栏与社区新闻尤为突出，内容多围绕华人社会日常生活、文化活动、节庆仪式与公共议题展开，在“日常事务”的叙述中不断强化华语的使用。表面看似松散、没有“输出”嫌疑的普通报道，事实上却在高度重复的叙事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可持续进入的语言世界。读者在长期接触这些内容的过程中，逐渐熟悉其语言表达、价值取向与叙事视角，从而在心理层面形成对这一语言共同体的情感依附，阅读行为本身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文化实践。

总之，日常阅读还构成了一种“想象中的共时性经验”：即使读者彼此并不相识，也会因为在相近时间阅读同一种语言文本、关注相似的议题，而形成一种共享现实的想象。这种由日常语言传播所生成的共时性感知，正是华人文化共同体得以持续存在和不断被确认的重要机制之一。

4 结语

华文报并非仅仅反映既有的华人文化认同，而是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通过书面华语的公共化、文化意义的语言承载以及日常阅读经验的持续再生产，深度参与了华人社会共同文化想象的生成过程。华语正是在报纸这一制度化媒介的支持下，获得了稳定的公共可见性，并在不断被使用、确认与再语境化的过程中，从个体交流工具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共同体语言。通过这一过程，分散于不同社会空间的华人个体，得以在共享的语言经验中建立起对“我们是谁”的认知与情感认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文报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并非依赖宏大叙事或显性的认同宣示，而是通过嵌入日常生活的高频率语言接触，在看似平常却高度稳定的阅读实践中，持续塑造读者的文化感知与身份想象。正是在这种日常化、常规化的语言供给中，文化认同得以被不断唤起和强化，并以一种缓慢而持久的方式嵌入个体的社会经验之中。这也提示我们，文化共同体的维系，往往并不取决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员，而更多依赖于日常传播结构中语言实践的长期积累。当然，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和语言生态的变化，华文报在当代马来西亚社会中的传播环境和影响方式也在发生调整，其在文化共同体建构中的作用面临新的挑战与转型空间。但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语言通过传播进入公共空间、并在日常经验中被不断重复和确认这一基本机制，仍然是理解文化共同体生成的重要理论线索。

参考文献

- [1] 邵宝辉. 不读华文报，只能看到半个马来西亚[J]. 新闻战线，2012（03）.
- [2] 巫连心. 马来西亚华文报研究现状综述[J]. 东南亚纵横，2010（11）.
- [3] 陈文博，张璐洋. 以文促治：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推进路径[J]. 社会科学辑刊，2025，（03）.
- [4] 曾晨. 共同体文化抑或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正当性及其证成[J]. 中国文化研究，2025（02）.
- [5] 杨牧，刘海涛. 从语言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4）.

作者简介：田秀华，女，（1983—），黑龙江密山人，法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共同体理论与华人社群研究。